

# 抱一而为天下式

## ——一代教育史学家吴式颖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吴明海

**摘要：**吴式颖先生是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开拓者与长期建设者。她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引领动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持中国立场的全球史观，不断探索建设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以“资治通鉴”的精神开展教育史的国际比较研究，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寻找多方史鉴；忠诚人民教育事业，以生为本，以史为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奠基性与榜样性贡献。抱一而为天下式，吴式颖先生体现了一代教育史学家的教育家精神，值得研究与学习。

**关键词：**吴式颖；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1-0017-13

吴式颖，女，安徽泾县人。1929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先生1949—1952年就读于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1953—1957年由国家保送至苏联列宁格勒国立赫尔岑师范学院<sup>①</sup>留学，系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教育学学者、卓越的教育史学家。

吴式颖先生是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开拓者与长期建设者之一。先生不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著述丰硕，是外国教育史研究专家，而且以其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团结全国各地教育史学者及其他学科学者，多方协同建设外国教育史学科；不仅为学科体系建设上下求索，而且执教杏坛，甘为人梯，培育一代代后起之秀，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奠基性贡献。<sup>②</sup>

顾明远先生在《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一文中评价吴式颖先生：“她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上，为我国教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楷模。”<sup>③</sup>同时顾先生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精神支持她这样不辞疲劳，勤奋耕耘？”<sup>④</sup>

**基金项目：**2024年度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外国教育史”（24JZDMG-XSD-060）。

**作者简介：**吴明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sup>①</sup> 苏联列宁格勒国立赫尔岑师范学院，即今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Herzen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of Russia）。

<sup>②</sup> 王保星、吴明海：《教育人风采——吴式颖》，《现代教育论丛》2023年第2期。

<sup>③④</sup> 顾明远：《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中国教师》2025年第4期。

他自问自答：“报效国家，一心为学术，为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sup>①</sup>

古哲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sup>②</sup>“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sup>③</sup>吴式颖先生虽非“圣人”，但她坚持著史，以史育人，将全部身心奉献给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抱一”精神是其一生的坚守，也是其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甚至是其生命之树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对我们有恒久的启示。

### 一、秉持中国立场的全球史观，不断探索建设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萌芽于20世纪初年，是清末“新政”时期睁眼看世界以图教育自强的一个重要窗口。1901年5月，罗振玉在上海创刊《教育世界》，开启在国内传播外国教育历史知识的先河。若以此为起点标志，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萌芽到现在已经历时125年。侯怀银教授等将20世纪我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初创阶段（1901—1918年）、初步发展阶段（1919—1948年）、以俄为师阶段（1949—1956年）、艰难探索阶段（1957—1978年）、恢复与重建阶段（1979—1986年）、深入发展阶段（1986—2000年）。<sup>④</sup>笔者同意侯怀银教授等的20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分期说，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2001年至今为全面发展阶段。这样，外国教育史学科从萌芽到如今，共经历七个阶段。除了清末及民国期间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教育史建设的五个阶段，吴先生均参与其中，从学习者、协助者到领军者，循序渐进，与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同步前进。

#### （一）对人类历史有积极兴趣的学习者（1949—1957年）

在以俄为师阶段，吴先生是学习者。1949—1952年，吴式颖求学于武昌华中大学（系华中师范大学之前身之一）的教育系，先因对农业感兴趣而副修生物学，后因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感兴趣而副修历史。在此期间，阅读过姜琦的《西洋教育史大纲》、雷通群的《西洋教育史》，对有关苏联教育的知识也有所学习。吴先生于1952年夏获得国家选派至苏联留学的机会，1952年8月至1953年8月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毛泽东主席题写校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53年8月正式进入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留苏四年，吴先生学习刻苦，各门功课均优秀，1957年获得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优等生的毕业文凭。吴先生留苏期间很喜欢教育史。她在口述史中回忆道，当时俄国教育史课程的授课教师为苏联俄联邦教育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绍·伊·加涅林教授，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授课教师为《世界教育学史》的作者叶·雅·戈兰特教授。两位教授的教育史课堂教学丰富且生动，他们讲述的乌申斯基、马卡连柯、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为人类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给当时求学的吴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吴先生也因此对人类教育的历史遗产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她省吃俭用买了不少教育家的著作带回国，包括乌申斯基、马卡连柯、克鲁普斯卡雅、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文集，另外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思想家的文选。无论在华中大学还是赫尔岑师范学院，作为学生的吴先生虽未明确以后研究的方向，但她对人类历史尤其是教育史有浓厚兴趣所以对此下了功夫，这为其终身从事教育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心

① 顾明远：《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中国教师》2025年第4期。

②③〔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7、56页。

④ 侯怀银、梁林珍：《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1期。

理与知识基础。

## （二）外国教育史建设的积极协助者（1957—1988年）

从艰难探索阶段、恢复与重建阶段到深入发展阶段之初，吴先生是积极的协助者。

### 1. 参加曹孚先生领导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1961—1979年）

1957年8月，吴先生留苏学成毕业归国，任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61年开始加入曹孚先生主导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及教材建设团队。吴先生当时第一项工作是协助曹孚先生，根据苏联相关教材，选编《外国教育史》。该教材为借用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2年5月出版。

吴先生当时第二项工作就是参与曹孚先生领导的新中国自编版外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1962年，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批准成立由曹孚先生领衔的外国教育史自编教材编写组，编写组成员包括滕大春（河北大学）、马骥雄（华东师范大学）及吴式颖（中央教科所）。吴先生当时刚30出头，是最年轻的成员，既是参与者，也是向各位先生求教的学习者。

曹孚先生于1962年主导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工作在新中国外国教育史中国化道路上具有高屋建瓴的开创性意义。1957年，曹孚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学及教育史研究参考苏联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要发挥我们的独立思考”，“避免跟在苏联的著作后面，亦步亦趋”。<sup>①</sup>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需要一定理论与政治勇气的。据吴先生回忆，在曹孚主导下，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组很快统一了教材编写思想，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尽可能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编写出一部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外国教育史教材。此部教材旨在打破以往仅以西欧为中心、以欧美教育为范围进行教育史问题论述的传统，力求能够比较全面地覆盖东西方主要国家与地区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总结外国教育的历史经验，从而深刻地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sup>②</sup>在此明确的编写思想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写组拟定并修改了《外国教育史编写提纲》，各位先生也均写成了部分稿件。由于“四清”“文化大革命”的接踵冲击，加之曹孚先生于1968年逝世，不仅编写工作停滞，而且已成稿件也下落不明。1972年，吴先生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清理图书馆外文资料室的时候，偶然发现提纲和已经写成的稿件，立即上报组织，稿件得到妥善保存。

1973年，吴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下半年，吴先生应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精心修订曹孚先生编写的借用版教材《外国教育史》，该书于1979年2月再版，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师范教育对外国教育史教材之急需问题。

### 2. 继承曹孚先生遗志，协助滕大春先生主持《外国古代教育史》教材建设（1979—1982年）

1979年，组织决定由滕大春先生继曹孚先生之后领衔主持自编版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工作。鉴于当时已成稿件多属古代史，于是编写组决定先编写一部《外国古代教育史》教材。在滕先生的领导下，由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合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于1981年6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虽属断代史，但“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拜占庭的教育”均

<sup>①</sup> 瞿葆奎、马骥雄、雷尧珠选编：《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sup>②</sup> 吴式颖口述，孙益、李曙光整理：《吴式颖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59页。

占一定比重,还增设了“日本的古代教育”,既突破了“西欧中心论”,也突破了苏联外国教育史教材的模式,所以“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教材”<sup>①</sup>。不过,吴先生在口述史中指出:“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将‘文艺复兴与教育’‘宗教改革与教育’和‘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三篇划到古代是欠妥的,分期不合理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明显缺点。”<sup>②</sup>

### 3. 协助滕大春先生主持《外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建设(1982—1989年)

从1982年起,外国教育史方面的教材建设工作继续在滕大春先生的主持下推进。编写组经商议后决定,在前期《外国古代教育史》基础上,以滕大春为主编、吴式颖为副主编,编写《外国近代教育史》教材,编写组成员还有马骥雄教授、金锵教授、张法琨教授、姜文闵教授、王桂教授等。该书于1989年1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点主要有:其一,它在内容上不仅论述了西方几个大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发展,而且增加了日本与印度的教育制度和思想,继续体现了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界打破以往以西欧为中心、以研究欧美教育为范围的传统;其二,继续克服苏联教育史学界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时出现的简单化公式化等倾向对我国教育史学界的影响,而以唯物史观对政治保守、哲学唯心的教育家拉夏洛泰、康德、杜威、赫尔巴特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我国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中具有一定的首创性。不过,吴先生在口述史中反思道:“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合理的历史分期问题在这本书中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sup>③</sup>

### (三) 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卓越领军者(1989年以来)

1989年,吴先生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申报外国教育史博士点及导师的活动,1990年10月均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继滕大春先生领衔的河北大学外国教育史博士点之后,吴先生领衔的北师大外国教育史博士点是全国第二个外国教育史博士点。二者承前启后,海纳百川,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由深入发展步入全面发展,进而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在此期间,吴先生等学者在不同时间节点发表系列史论<sup>④</sup>,通过反思与前瞻,不断提高了外国教育史乃至整个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自觉意识。

#### 1. 主持和完成“外国现代教育史”课题研究(1991—1995年)

1991年6月,吴式颖先生领衔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外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工作,课题组成员有福建师范大学李明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单中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辽宁师范大学王桂教授、杭州大学徐小洲教授,以及张斌贤、褚宏启、杨孔炽、陈如平、王保星等吴先生的博士生。1995年12月,该课题的主要成果《外国现代教育史》一书完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12月出版,并于1998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sup>①②③</sup> 吴式颖口述,孙益、李曙光整理:《吴式颖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98—99、102页。

<sup>④</sup> 例如,金锵、吴式颖:《四十年来的外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4期;吴式颖:《让过去启示未来——吴式颖八十自述》,《教育学报》2009年第5期;吴式颖:《改革开放40周年外国教育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科学》2019年第1期;吴式颖、姚宏杰:《回忆与期望:我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2018年第2期;吴式颖、郭法奇:《新中国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4期;吴式颖、田正平、张斌贤:《守正创新永向前 教育史坛谱新篇——庆祝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2期;吴式颖:《关于外国教育史著作和教材的回忆与感怀——写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4期。

秀成果奖二等奖。该书的主要成就有四点。其一，体现了多元化的全球视野。在欧美教育研究中，不只限于研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教育，还研究了瑞士和瑞典的教育；在欧美之外，还研究了日本、印度、埃及和巴西等国的教育。其二，在深入考察、综合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地处理了外国教育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即以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作为外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起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三，在揭示20世纪各国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注意阐述教育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全面地总结了20世纪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其四，根据该教材分期依据，将杜威移至该教材，并对杜威等重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出更加全面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 2. 主持和完成《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工作（1995—2017年）

在完成《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三本教材编写工作的基础上，吴先生也在指导其博士生张斌贤、褚宏启、朱旭东等合著的《西方教育思想史》并为之作序的过程中，萌生了研究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想法。1995年年末，吴先生与湖南教育出版社达成《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出版协议，并邀请华中师范大学任钟印教授与她共同主持此项研究编写工作。该通史共10卷约480万字，于2002年10月出版，获国家图书奖。王炳照先生认为该通史既放眼世界且尊重历史，是一部迄今为止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研究外国教育思想发展历史的巨型学术性专著。<sup>①</sup>2017年，《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修订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是中外学术界对关于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各主要地区教育思想发展进行系统的通史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其时空之辽阔、体系之科学、史料之翔实、方法之多元、史论之辩证、队伍之齐整，是前所未有的，因之成为外国教育史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为后续21卷本《外国教育通史》研究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3. 主持和完成21卷本《外国教育通史》的编写工作（2017年至今）

在《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修订版基础上，吴式颖先生与李明德先生主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外国教育通史”。该项目最终研究成果共21卷，约1000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1月出版。顾明远先生认为该通史“不仅摆脱了以往‘西方中心’的偏颇，而且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根本上考察了人类教育的发展历程，重新阐释了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古与今、史与论、共性与个性、东方与西方、思想与制度等问题，拓宽了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范畴，成为外国教育史的经典之作”<sup>②</sup>。如果说姜琦编著的《西洋教育史大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等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成果的重要代表，曹孚编的《外国教育史》（1962年版）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成果的重要代表，上述《外国古代教育史》（1981年版）、《外国近代教育史》（1989年版）、《外国现代教育史》（1997年版）、《外国教育思想通史》（2002年版）及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994年版）等著作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成果的重要代表，那么可

<sup>①</sup> 王炳照：《放眼世界 尊重历史——初读〈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7期。

<sup>②</sup> 顾明远：《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中国教师》2025年第4期。

以说,吴式颖、李明德主编的这套21卷本《外国教育通史》是我国外国教育史学者,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为指导,集以往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史研究之大成,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成果。它更凸显中国立场的全球与多元化视野,是传统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革新性的转变,在探索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套厚重的通史著作,不仅获得学术界权威肯定,而且受到社会欢迎,于2025年先后入选韬奋基金会“韬奋好书”、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大学出版好书”。

概言之,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起步以来,吴式颖先生就与诸位前辈学者、同辈学者及后起之秀,在长期共同探索中,得出外国教育史中国化的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共识,即既要学习苏联,也不能照搬苏联;既要研究西方,也不能以西欧为中心且局限于欧美主要国家的研究,而是要以公正的人类文明史观,书写具有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外国教育史。<sup>①</sup>当然此探索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更新更美更广阔当然也更艰难的道路需要后继者一代代去开拓。

## 二、以“资治通鉴”的精神开展教育史的国际比较研究,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寻找多方史鉴

吴式颖先生“视野宽阔、博学多知、学术功底深厚”<sup>②</sup>,认为教育史学者既要学有专攻,又不能局限于一隅,应该专博结合,最好中外兼通;治史不仅要有探求与记录历史真相的精神,而且要有为改进实践寻找史鉴的精神。她立足当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通过开展中外教育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比较,力图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寻找“他山之石”。

### (一) 参与张瑞璠先生和王承绪先生主持的“中外教育比较史”课题(1988—1996年)

1988—1996年,吴式颖先生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学家张瑞璠教授和杭州大学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之邀参加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中外教育比较史”。吴先生与河北大学中国教育史专家阎国华教授合作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其中,近代卷中的“本卷引言”(约1.5万字)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约7万字)由吴先生撰写,深刻阐发了中外教育近代化历程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及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路径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积极且深远的影响,彰显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外史学的深厚功底及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之路的深刻历史洞察。该项研究为后续“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 (二) 主持和完成“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课题研究(1992—1998年)

1992—1998年,吴先生主持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由先生与其七位博士生(张斌贤、褚宏启、朱旭东、杨孔炽、吴国珍、陈如平、王保星)共同完成,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为《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共72万字,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该书是中外学术界第一部从历史视角研究域外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专著。全书聚焦何为教育现代化、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等基本问题,

<sup>①</sup> 王保星、吴明海:《教育学家风采——吴式颖》,《现代教育论丛》2023年第2期。

<sup>②</sup> 顾明远:《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中国教师》2025年第4期。

对教育现代化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印度、韩国八个国家为案例，通过历史视角分析各国教育现代化的特点及其共同规律，以图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无论对学术理论还是对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 （三）撰著《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2002—2005年）

吴先生在上述她领衔主编的《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中，负责“俄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研究与写作工作。在该课题的基础上，吴先生以教育现代化的视角为切入点，用数年时间完成《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一书的撰写工作。全书共计59万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部具有通史性的俄国教育史经典著作，也是国别教育史研究与书写的典范之作。

《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分为三编，即“俄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教育现代化变革”“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以“教育现代化”问题贯穿全篇，从教育形态的变迁和教育现代性的增长状况两个维度，不仅对俄国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具体考察与梳理，并对其教育现代化产生的机制、面临的挑战、应对的策略进行了详尽剖析，而且深刻揭示了俄国教育与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国家发展要素从古至今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从历史纵深、世界视野探讨了俄国教育现代化两方面的历史成就、经验与教训，深刻总结俄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特点，即渐进性、曲折性和独特性。

吴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主攻俄国及苏联的教育史研究，是我国著名的俄国及苏联教育研究专家之一。她很早就萌发写一部关于俄国和苏联教育史的专著，一直为此积累史料，并为此完成了多种译作和著述。据不完全统计，就译作而言，主要有：吴式颖、臧仲伦、方莘合译的苏联学者德廖莫夫等编著的《美育原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吴式颖编的《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下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首版，2005年再版；吴式颖等合译、巴班斯基主编的《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吴式颖、周蕙、朱宏翻译、H.A.康斯坦丁诺夫等著的《苏联教育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96年出版；协助卫道治选编《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并撰写前言“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该文选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首版，2006年再版。吴先生1989年访学苏联期间的主要工作也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俄国教育史史料。在著述方面，她不仅系统研究和评介了俄国及苏联教育制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迁历程及其规律，而且系统研究和评介了乌申斯基、克鲁普斯卡雅、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赞科夫等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所以，于吴先生77岁时出版的《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可以说是吴先生的心血之结晶。

《俄国教育史——从教育现代化视角所作的考察》受到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肯定。

李莉博士、肖甦教授等认为，该书视野宏阔，在时间上突破了苏联时期的限阈，对俄罗斯千年教育史进行了系统考察与剖析；空间上跨越了俄罗斯疆域，将俄国的教育历程置于世界文明背景中进行考察；内容上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俄国教育进行多维度研究，从而构筑起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国别教育史研究范式。<sup>①</sup>

<sup>①</sup> 李莉、朱旭东、肖甦：《客观分析历史，理性探讨得失——〈俄国教育史〉述评》，《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比较教育学家王长纯教授更是撰文以“深邃、开阔、从容、厚重”八个字高度概括与评价吴先生此著作，即“深邃的历史场景”“开阔的比较视野”“从容的辩证分析”“厚重的启发意义”<sup>①</sup>。在文中，王教授将阅读体会与吴先生的交往体会有机结合进行评述，认为该书在方法方面为教育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多因素与长时段相结合、复杂性与辩证性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在文风方面具有班彪评论司马迁《史记》所说的“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的古史文品，还谦虚地说：“一本好书就是一所学校，作为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我衷心地感谢吴式颖先生。”<sup>②</sup>吴先生为人为学是一致的，王长纯教授八字书评其实也是对吴先生人品的中肯概括，构建起一代史学家应有的品格。

俄罗斯是教育大国，既在世界教育格局中有重要地位，又是我国的重要邻国，其不同时期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均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吴先生无论是从历史纵深角度研究俄国教育现代化，还是从教育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俄国教育史，均有利于我们更客观、更深沉、更冷静地评价中俄教育交流史及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影响的经验与教训。

综上所述，从近代教育史国际比较研究到外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综合研究再到俄国教育现代化历史的专门研究，吴先生寻找外国教育现代化对我国的历史借鉴形成三部曲，且是步步深入的。

### 三、以生为本，以史育人，上善若水，传承师道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sup>③</sup>吴先生长期治史并以史育人，虽然不是“处众人之所恶”，但的确是“小众”事业，加上“先生质朴无华，和善谦逊，为人低调，不求闻达，走在校园里，人们很难把她同学术权威的形象联系起来”<sup>④</sup>。先生具有民主精神、人文情怀，无论是对同行、对同事、对朋友，还是对学生，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确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如果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这位智者的外在形象，那么可以说“上善若水”则是这位仁者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以人为本”是一代史学家接人待物的底色，那么可以说“以生为本”是一代师者教书育人的根本出发点。

#### （一）精益求精不断编修外国教育史单行本教材

总体而言，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首重教材建设。无论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吴先生参与或主持的《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现代教育史》，戴本博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三卷本，1990年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三位先生编著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卷，1984—1985年版），都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重要的教材，均受广泛好评。然而，上述教材大都属多卷本。为进一步满足读者的需要，吴先生从1983年起着手领衔组织编写单行本外国教育史教材。经过共同努力，吴式颖、赵荣昌、黄学溥、李明德、单中惠、徐汝玲共同署名的单行本教材《外国教育史简编》问世，由教育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外国教育史简编》是继曹孚先生1962年编写出版的单行本借用版教材《外国教育史》之后的第一本自编版单行本教材，1989年获光明日报社

①② 王长纯：《深邃、开阔、从容、厚重——读吴式颖著〈俄国教育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

③〔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页。

④ 褚宏启、王保星：《走向教育历史的深处——吴式颖教授的学术追求》，《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组织评审的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修订版于1995年出版。1995年，吴先生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诸惠芳编审商定，按更高标准主持新编单行本教材《外国教育史教程》。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99年8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版教材由吴式颖任主编，由李明德教授、单中惠教授任副主编。该教材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重点教材项目，2002年荣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为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吴先生又组织了该书缩编本的编写工作，于2003年出版。原编本与缩编本教材均受到广泛欢迎，均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品牌教材。2015年《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吴式颖、李明德任主编，张斌贤、单中惠任副主编）出版，此版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学者协作完成，资料更扎实，历史分期和体系结构更合理，于2021年10月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评选中荣获高等教育类二等奖。《外国教育史教程》第四版已经编修完毕，正待出版发行。

吴先生也很重视教学与科研工具书的开发工作。她先后于1986年、1992年应顾明远先生之邀参加《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分卷的写作与修订工作，2002年应邀担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教育史分卷》主编，2002—2007年应邀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教育史部分词条的修订工作。

## （二）教学民主，教学相长，满座春风

吴先生曾在其未发表的《我的学习、学术探究生涯与教育史观》一文中说：“我并不好为人师，但爱护、尊重自己的学生，崇尚教学相长。我把学生视为自己的朋友，和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外国教育史的各种问题。我的博士生都参加我主持的研究课题，在学习、研究中获得成长。”<sup>①</sup>

顾明远先生在《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一文中，认为吴先生“在培养博士研究生上，对学生爱之甚切，坚持学术民主，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许多学生现在都成为教育学科研究的骨干”<sup>②</sup>。

作为吴先生的学生，我们对吴先生的主位自述、顾先生的客位评价是感同身受、完全认可的，诚然我们离两位老师的期盼还是很远的。

毛祖桓教授，吴先生的首位硕士生，曾经在《回忆我的几位老师》一文中写道，吴式颖先生对我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所倾注的心血恐怕要超过许多导师对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吴先生亲自为我查找有关文献，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如中央教科所的胡克英教授、中国社科院的陈元晖教授、北京教育学院的温寒江院长、杭州大学的王承绪教授和金锵教授等，都是亲自带我上门求教。<sup>③</sup>这哪是指导作文，分明是在指导我如何敲开学术之门、智慧之门。

张斌贤教授，吴先生的博士生大弟子，回忆当年“外国教育名著选读”“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等课程，说：“在先生的课上，先生和学生在阅读教育著作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苏格拉底式’的平等讨论，在富有启发和引领性的交流中引领学生理解教育，感悟教育

① 褚宏启、王保星：《走向教育历史的深处——吴式颖教授的学术追求》，《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顾明远：《走进人类教育历史深处的耕耘者》，《中国教师》2025年第4期。

③ 吴式颖口述，孙益、李曙光整理：《吴式颖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253页。

的历史。”“先生在教学与研讨中，每每为教育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献身于人类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而感佩不已。先生以自身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投入和言传身教极大地感染和影响了追随先生的青年学子。”<sup>①</sup>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曾经在导师夏之莲教授的建议下就硕士学位论文求教于吴先生并旁听吴先生的上述课程，对张斌贤教授上述回忆有真切深刻的感受。当然，这不是吴先生课堂独有的场景，也不是北师大课堂独有的场景。其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神州大地万木逢春，百花吐艳，虽百家争鸣，风格各异，但殊途同归，万法归一，这就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言，这是教育学的“一个时代的集体荣耀”<sup>②</sup>。

先生不仅求真、向善，而且爱美，极富生活情趣。每每同门聚会，先生常常带头唱歌，或民歌小调，或革命歌曲，其乐观主义精神感人至深。先生现在还与向蓓莉（史静寰教授的博士生，现任北师大教育学部教授）每周一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sup>③</sup>行笔至此，《论语》中师生对坐的情景仿佛浮现于眼前。

吴先生的家经常是谈笑有鸿儒，往来尽学生。不仅有自己的直系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学生的朋友。她也常常到学生宿舍、学生家里走动走动。不仅谈学术问题，也谈社会话题与生活趣事。记得她的学生的学生，一次从吴先生家回来跟我说，压力山大，实在“卷”不动了，到吴先生家坐了一会儿，放下了，放松了，可以轻装上阵了。笔者也有同感，遇到实在解不开的疙瘩，只要到吴先生家坐坐，就豁然开朗了，好像“开悟”一般。

### （三）有教无类，植树造林，爱满天下

吴先生注重科研育人，以有组织科研培养队伍。吴先生主持的科研课题，课题组成员总是老中青三结合，不仅有自己的弟子，而且包括多地多校多个学科的学者。以21卷本《外国教育通史》为例，集合约150名学者协同攻关，每卷主编及其成员的结构均是老中青三结合，而且多卷着意安排中青年学者担任第一主编，前辈学者压轴，可见其为培养队伍之心之所善也。

吴先生不仅在北师大培养学生，还到外地外校培养学生。吴先生曾经多年到河北大学协助滕大春先生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吴先生70岁退休之后还多次不辞劳苦应邀参加校内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且每请必到。例如，在北师大校内多次参加史静寰教授、肖甦教授、张斌贤教授、朱旭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校外多次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吴先生2011—2013年先后主持笔者三届共六位博士生论文答辩会。记得2013年春季学期一天上午，吴先生连续主持三位博士答辩之后，饭都没吃就急着回家，才知张羽先生<sup>④</sup>当天突然发病。

退休之后，吴先生还多次应邀到多校讲学及参加学术活动。例如，年届八十回母校，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师生作了“教育史的社会功能”的学术报告（2009年6月）；年届九十，给中央民族大学师生作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与外国教育史发展”的学术报告（2018年10月）。

<sup>①</sup> 吴明海、张斌贤：《引领学生学习、感悟人类教育的历史——吴式颖先生的为师之道》，《中国教师》2019年第10期。

<sup>②</sup> 周作宇：《教育学：一个时代的集体荣耀》，《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sup>③</sup> 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6页。

<sup>④</sup> 张羽（1927—2020），原名崔锡祯，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今赤峰市）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前所长、《外国文学评论》首任主编。1946年参加革命，1952年赴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57年春与吴式颖在苏联结婚成家。

此外，她还多次参加学术会议，例如：“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国际讨论会”（2009年）、“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国际讨论会”（2009年）、“中俄纪念乌申斯基诞辰200周年教育研讨会”（2023年）等。

概括起来，吴先生集经师与人师于一身，既是传授学问的导师，也是学生人生的向导，其教育教学实践彰显“史家之智慧，师者之光辉”。具体有如下特点：其一，将学术民主与教学民主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其二，爱与微笑，始终包容、信任并寄积极的希望于学生，善于寻找并抓住亮点，因势利导，及时肯定与鼓励，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其三，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不仅关心学生学业，也关心学生家业与事业，期待学生成为人生赢家；其四，她是终身学习者与终身教育者，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而“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sup>①</sup>。

#### 四、爱国主义是先生不竭的精神源泉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sup>②</sup>，“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sup>③</sup>，《论语》所言，可谓吴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那么，先生根本的精神动力源于何处？这就是爱国主义。

吴式颖于1929年9月24日出生于河南信阳。信阳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依山傍水，鱼米之乡，茶青麦黄；路通东西，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之地；地接南北，兼有农林茶商之利。吴式颖家族源于宣纸故里——安徽泾县茂林镇，家学传统与故土情节根深蒂固。<sup>④</sup>其父吴颖生先生是一位小微商和小知识分子，爱家、爱国，富有正义感，热心公益事业，重视子女教育。吴先生发蒙于其父创办的信阳商会小学，但喜“以捕鱼为业”，在此度过天真、调皮、宁静、短暂的童蒙时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6月日寇进犯豫南，吴家房屋遭日机炸毁。吴父不愿苟活于日寇铁蹄之下，带领全家开始了近八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先后逃至武汉、长沙、益阳、湘潭、衡阳、桂林、贵阳、重庆。在逃难过程中，少年吴式颖一路目睹日寇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也亲历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心、坚决抵抗、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同时在各地学校受过或长或短的抗日救国的教育，主要有湘潭的石潭镇小学、衡阳的湘桂铁路扶轮小学和盐务局慈保小学<sup>⑤</sup>、桂林的汉民中学、重庆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历经全民族抗日战争全过程，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吴式颖的心田。

<sup>①</sup>〔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0页。

<sup>②③</sup> 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94页。

<sup>④</sup> 2017年端午节期间，吴式颖回到其家族阔别四代的泾县故里，拜谒新四军军部旧址、吴氏大宗祠，参观茂林镇中小学，向泾县和繁昌区图书馆赠予《外国教育思想通史》（10卷本）等著作；2024年年初《外国教育通史》（21卷本）一出版，就向泾县图书馆赠送一套，表达其深深的故乡情。

<sup>⑤</sup> 客居衡阳期间是吴式颖系统接受小学教育的关键期，其间发生了一件对其人生颇具象征意义的趣事。在入读慈保小学之前，吴式颖名为“爱珠”。她不甚喜爱此名，就请当时的班主任魏老师改名。魏老师钦佩其父吴颖生先生的家国情怀，就将“爱珠”改为“式颖”，寓意“以父亲为榜样”。吴式颖甚喜此名，“吴式颖”沿用至今。2025年11月，吴式颖将《外国教育通史》（21卷本）及《吴式颖口述史》等赠予衡阳市图书馆，表达对衡阳栽培的感恩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先生先后辗转求学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长沙明宪女子中学。“大后方”的逃难经历及在各地的辗转求学，让吴先生对中国国情有初步的实际体验。在长沙明宪女子中学读书期间，长沙面临和平解放的形势。吴先生在功课学习之余，与同学们传看一些进步书籍，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受到初步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启蒙。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之后，吴先生即赴位于武汉的华中大学教育系求学。当时华中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吴先生多次交流，使她懂得了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不仅要为自己个人和家庭奋斗，还应同时致力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全人类的解放。<sup>①</sup>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吴式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革命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学习、宣传与实践活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1949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1950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秋至1952年春，受组织安排，她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由此深入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和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如何将党的理论、政策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能力，增强了党性，也丰富了人生阅历。

参加土改结束返校，学校推荐吴先生赴苏联留学。在留苏预备部学习期间，除了业务课学习，还接受了对党忠诚的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一辈子跟党走的决心。1953年8月踏上赴苏留学之路前夕，她与留苏同学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告诉即将赴苏留学的同学，他们每人每年的学习生活费用相当于国内好几百个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吴先生回忆说，当时同学们心灵都深受震撼：“这使我们深切地懂得了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任务，以回报党和人民的恩情。”<sup>②</sup>在党的亲切关怀与着意培养下，她对党对人民有了更深刻了解、更深厚感情，爱党、爱国、爱人民有机结合，爱国主义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成为其自觉意识与根本动力。“回报党和人民的恩情”成为其初心与使命。她不仅用四年留苏期间的优异学业成就践行了自己的初心，而且用一辈子学术成就与教育成就履行了并继续履行着党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

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从抗日战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1929年至今，吴先生不仅见证了这一伟大历程，而且犹如小溪归于江海，将自己的整个青春与生命融入了这一伟大的时代。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引领为动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长期坚持治史并以史团结人、培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基础性、榜样性贡献。拙文题为“抱一而为天下式”。“抱一”是本文对吴先生以教育史学家身份的教育家精神的总结；“为天下式”，是想说吴先生的治学经验、育人经验的确是值得广大学者研究与学习的。正如一位同学读本文初稿感言：“吴式颖先生以爱国立志、以学术立身、以历史立论、以人格立教，形成了贯通学术与教育、融合史家与师者的教育家精神。她既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性学者，也是一位以生命赴使命、以清风化后学的教育家典范。”根据前文所述，吴先生本人一向不愿意好为人师，更不会愿意“为天下式”。但根据对吴先生学术民

<sup>①②</sup> 吴式颖口述，孙益、李曙光整理：《吴式颖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1页。

主精神的一贯了解，笔者相信吴先生是会允许本文用“为天下式”一词的。作为一家之言和个人的真实感受，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是否恰当，可以就此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

(责任编辑：李 卯)

**Embrace Oneness and Become the Model for the World: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of  
Wu Shiyong, a Pioneering Historian and Educator**

Wu Minghai

**Abstract:** Wu Shiyong is one of the key pioneers and long-term builde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China. Guided by patriotism, she integrat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heres to a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rounded in the Chinese stance, and continuous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of foreign countries. With the spirit of history as a mirror, she conducts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s to seek for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 She is devoted to people's education, prioritizes students and history, nurtures talent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 making foundational and exempl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Her commitmen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a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worthy of study and emulation.

**Key words:** Wu Shiyong; educational history of foreign countrie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中国教育史研究话语传播暨郭齐家教授从教65周年  
学术座谈会成功举行**

2025年10月18日，中国教育史研究话语传播暨郭齐家教授从教65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承办，《教育史研究》编辑部、《中国教育科学》编辑部、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分会和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协办。施克灿、葛新斌先后主持会议。朱旭东、陈露茜和刘立德先后致辞。王迎兰宣读了日本株式会社树立社的贺信。会上举行了郭齐家教授著作《中国教育史》日文版揭幕仪式。郭德俊、俞启定、于述胜对郭教授著作日文版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郭教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张传燧、高益民、杜育红、叶富贵对郭教授的学术研究理路作了深入分析。顾春、郑航、储朝晖、刘伟深情回顾了昔日追随郭教授求学的岁月。孟旭、相力、吴明海、葛新斌探讨了郭老师的教学特色。于建福发来贺信，李庚子从韩国通过视频致贺词。大家认为，郭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领军人物，在中国教育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平台传播等方面贡献卓著。郭老师最后总结发言，号召青年学子要戒慎名利、谦抑自守、守正创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统的力量。(刘畅 贺圆圆)